**附件1**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实践**

来源： 《红旗文稿》　作者： 余达淮 曲韵畅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创见，是中国就改善世界格局、发展周边关系所做的新探索，也是在中国经济总量日益攀升、在世界市场的角色与地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这一经济全球化重要载体的积极回应。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世界市场的相关研究，是其长期关注的重点，马克思甚至曾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专门构想过一部“世界市场册”，虽然最终并未完成，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阐发了许多关于世界市场的重要观点与构想。以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来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一带一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进一步来说，这种新实践可从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研究的三个核心主题，即属性认定、危机应对和话语权来理解。

　　1.“一带一路”坚持了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中性属性的认定。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世界市场的本质属性是中性的。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传统的地区贸易逐渐被世界性的贸易所替代，原本由封建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已远远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求。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这种发展是异常快速与深刻的，以至于马克思也不禁写道，在短短的一百年间，世界市场的发展竟然比以往几个世代的全部发展成果还要大。世界市场的大步向前，正是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重要方面之一，而这一切的结果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曾经长期持“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观点，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中人为搞乱“姓资”与“姓社”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误读，在马克思的认知中，世界市场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平台，更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反映，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世界市场的特征也就不尽然相同，但是始终只有一个世界市场，并且其本身并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沿着马克思这一思路的继续深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因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世界市场对谁都是开放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才能在这片“汪洋大海”中不断捶打自身，加强本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步入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一带一路”本身正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务实举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基于此，“一带一路”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就如何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新愿景，它首先体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中性属性认定的坚持。

2.“一带一路”拓展了世界市场危机应对的思路。马克思通过对大量经济数据的研究，曾认为世界市场的危机大约每10年出现一次。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虽然危机所出现的具体时间并不一定是马克思所预想的10年，但是危机的破坏力却越发惊人。并且在经济危机之外，危机本身也呈现多样化，如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等。究其根本，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资本往往可以无限制地发展，通过种种对技术流与资金流的限制进而实现自身增殖的最大化。以至于马克思写道，世界市场仿佛自此沾染上了一种“热病”，而治疗这种“热病”的方法，却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将“资本的秘密”继续遮盖，进而将危机转嫁于世界市场的其他方。为此，从马克思的那个年代开始，世界市场危机的应对，每次都需要经历一次剧烈的“阵痛”才能勉强度过。但是世界市场的中性属性，决定了这些危机既可能通过世界市场加速蔓延，也可能通过世界市场得到缓解。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以邻为壑地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思路，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可以预见，当前现代资本还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那么世界市场中就确实存在被新的危机所笼罩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承认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世界市场的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应该审慎思考危机的应对方案，这是大国责任与义务的体现。马克思在研究亚洲问题时，就曾表示过应该使世界市场服从于各民族的“共同监督”，“一带一路”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世界市场中的各个参与主体不仅要共同监督，而且还要进一步提高在世界市场中的参与意识与分享意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到的：“‘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关于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新探索，其精髓在于这种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思路与方法并不是转嫁危机，而是共同直面可能的危机，同时，通过对资本的有效合理制约，也就是通过协商对话，将资本置于“阳光”下，即对资本予以有效的规约，以实现世界市场中危机的规避。事实上，这也是对世界市场危机应对思路的重要拓展和创新。

　　3.“一带一路”改善了世界市场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研究世界市场的历程中，还特别关注世界市场中的话语权问题，而世界市场话语权本质上是各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反应。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占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现象尤以英国最为突出。英国利用其自身的“先发优势”，凭借其巨大的经济总量与技术的垄断地位，在世界市场中肆意横行，打着“经济进步”的旗号，不断压制世界市场中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并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以至于马克思写道英国堪称“世界市场中的暴君”，这样一个大国非但没有将世界市场的发展摆入正轨，反而发挥着一种“世界市场恶魔般的影响”。马克思及其逝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都是处在一种严重不对等的状态下，这种不对等带来的是马克思所言的“文明的暴行”，与更加不平等不均衡的发展。可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原先世界市场中各个参与主体间的和谐共存、互通有无的，如“田园诗般”的和睦关系，也被淹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中”。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正是意欲重新改善世界市场参与主体间关系的重大举措，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一带一路”的精神，源于中国的“古丝路精神”，而“古丝路精神”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上，已经留下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当然“一带一路”，并不是“古丝路精神”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加富有时代特征，符合全人类诉求的构想下展开的。事实上，如果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间长期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或者说再次被“暴君”所统治，世界市场最终只会是资本以及霸权主义的“温床”，那么全人类的命运，必然会遭致蔑视乃至毁灭，只有弘扬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利益，世界市场才不会成为资本以及霸权主义的“乐土”。

　　“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通过“一带一路”的实践，我们既看到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科学分析与思考，也看到了世界市场上“中国力量”的崛起，使我们能够沿着马克思的思路，为世界市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而“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内在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用马克思的那句话就可以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河海大学教授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附件2**

**《共产党宣言》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来源：红旗文稿 田文林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从历史纵深审视现实不难发现，岁月磨砺并未埋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未因苏联解体而销声匿迹，相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光明前景。

**一、《共产党宣言》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政治立场、崇高理想、革命纲领、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科学洞见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阐述的科学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1.《共产党宣言》的科学论断至今仍不过时。 经典文献的价值就在于其能够揭示事物基本规律，其基本观点历经风雨和时间考验，依旧光芒四射，生命力不减。《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的经典文献。在这部经典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同样不可避免；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领导阶级；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它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消火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引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并一直绵延至今。

　　曾几何时，尤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自行消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未能摆脱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无法克服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矛盾。

　　过去相当长时期，西方国家一直靠 “时间-空间转移”方式缓解矛盾。所谓“时间转移”，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在生产领域实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在此之前，西方已经历三轮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使资本主义寿命一延再延。时至今日，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出现，由此使资本主义靠“时间转移”的余地越来越小。

　　所谓“空间转移”，就是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逃避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宿命。尤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使西方国家获得了攫取他国财富、扩大市场的绝佳机遇，并因这场前所未有的饕餮盛宴而一度欣欣向荣。美国作为最大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一度出现持续一百多个月的创纪录的连续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困境加剧，并最终在2008年酿成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西方领导人开始捧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试图从中寻求解困思路。但在现行政治经济统治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不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美国经济看似日渐复苏，但实际上经济金融化、金融泡沫化趋势加剧膨胀。这也意味着其结构性危机正在进一步深化。

　　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一反美国长期倡导的经济全球化政策，为了所谓的“美国第一”，陆续退出多个多边贸易机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向中国挑起贸易战。这种“逆全球化”政策表明，西方国家已经黔驴技穷，找不出解决自身问题的好办法，只能逆时代潮流而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困境从侧面说明，当年《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批是何等准确、深刻！

　　2.《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性，铸就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理论品格。《共产党宣言》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其正文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并为其实现自身阶级解放不断鼓与呼。《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这种直抒胸臆的理论风格，铸就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敢于担当的理论品格和政治风格。

　　马克思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因为他们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此与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为伍就是与真理为伍，就是顺应历史规律。

　　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总是遮遮掩掩，口是心非。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本身是少数，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信奉“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论，并由此走向精英主义乃至“纸牌屋”式的密室政治。这种史观的另一面，就是恐惧和敌视多数民众，并想方设法用低智商的价值观麻痹民众，使之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斗志。例如，1995年，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旧金山举行的西方精英会议上，提出了“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即将英文titts“奶头”与entortainment“娱乐”组合在一起，意指为了让20%的高端人口高枕无忧，采取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80%的低端人口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性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这些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占用人们大量时间，并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整天浑浑噩噩。

　　西方国家的政治理论层面更是充满迷惑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本身是少数，其经济剥削和阶级专政缺乏正当性，因此其政治经济统治“做得说不得”。如果资产阶级也赞同阶级斗争学说，公开宣称当权是代表少数人，势必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与反抗。为确保大资本势力的长久统治和物欲享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刻意回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普遍很虚伪，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简言之就是道貌岸然。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口号，热衷于推行西式“宪政民主”，强调程序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些口号和政治机制，可以不着痕迹地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美国的选举政治看似“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实则是“用美元买选票”的金钱政治。无论谁当选，代表的都是大资本利益。当前，美国枪支泛滥、校园枪击案频发，90%以上民众赞同禁枪，但因“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阻挠，禁枪法案始终难以通过。这种怪现象就是金钱主宰政治的必然结果。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理想信念的现实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有道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马克思主义学说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其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有关。《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毕竟完成于170年前，主要是基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做出的分析判断。因此，我们向这部经典作品致敬，不是寻章摘句、照搬照抄，把其中每段话当作教条直接使用，而是在掌握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理论创新。从哲学角度看，一般性蕴于特殊性，特殊性体现一般性。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探索真理，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事实证明，《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者探求真理的开端。马克思本人在完成《共产党宣言》后，继续坚持理论创新与发展，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完整体系，尤其马克思花费二十多年心血完成的皇皇巨著《资本论》，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此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科学理论落实为革命斗争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实践品格的列宁主义，并最终在俄国这一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建立起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震撼并改变了整个世界。

　　中国共产党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过马克思主义的熊熊火炬，并通过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尤其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能否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许多人心中无底，主张“补课论”者不乏其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了清醒认识。

　　毛泽东在1965年曾专门说过：“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邓小平也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迹。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而且，就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过近70年的建设实践，中国从一穷二白的传统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蒸蒸日上，这从侧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长期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状态。

　　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更需要增强战略定力，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尤其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上，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老路”，也决不能走“邪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奔向更加美好未来的根本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对于全党来说，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犯颠覆性错误。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新动能**

　　《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共产党人历来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的团结联合，就不可能彻底推翻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也日益重塑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各种弊端积重难返，甚至连西方大国自身都治理失灵、问题成堆。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国际上，中国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受到高度赞赏和广泛认同，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并在不同场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重要阐述，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创新成果，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就是中国践行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这种天下情怀和崇高境界，与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所谋求的“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作为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其心目中最理想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轴心—辐条”格局，尤其对非西方世界更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凡是不肯臣服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国家，很容易遭受孤立、制裁乃至武力打击。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等，无不是出于同样的原由。尤其在当前，随着美国经济解困乏术，特朗普政府一味强调“美国第一”，为满足一己之私，不惜以邻为壑，一意孤行，先后退出多个多边机制，并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种狭隘自私的做法，从侧面表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无可挽回的颓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和认真思考世界范围内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高下与优劣。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探究、学习，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光明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